



#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Marx's Concept of Capital

周可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Marx's Concept of Capital

周可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 周可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22637-5

I. ①马… II. ①周…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研究 IV. ①F014. 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1116 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

MAKESI DE ZIBEN GAINIA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

策划编辑: 祁传华

责任编辑: 王新焕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云虎

责任印制: 马洁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目 录

导 论 从未消逝的幽灵 .....	(1)
第一章 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思想来源 .....	(17)
第一节 市民社会的兴起与近代早期政治哲学 .....	(17)
第二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本理论 .....	(28)
第三节 18、19世纪德国思想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41)
第二章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资本概念 .....	(51)
第一节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资本概念的形成 .....	(51)
第二节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资本概念的内涵 .....	(55)
第三节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资本概念的意义 .....	(63)
第三章 唯物史观确立时期的资本概念 .....	(67)
第一节 “社会关系”概念的理论前史 .....	(67)
第二节 “社会”、“社会关系”与“资本” .....	(81)
第三节 资本与现代社会批判 .....	(95)
第四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资本概念 .....	(110)
第一节 资本的形成 .....	(111)
第二节 资本的历史规定性 .....	(125)
第五章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哲学 .....	(145)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原则 .....	(145)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历史观 .....	(154)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的辩证法 .....	(162)

## 2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第六章 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理解、运用与发展 .....	(174)
第一节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扬 .....	(174)
第二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 ...	(186)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	(221)
第四节 《资本论》与中国革命 .....	(242)
结语 .....	(256)
附录一 国内外马克思资本概念研究概况 .....	(261)
附录二 青年马克思论贫困 .....	(272)
参考文献 .....	(286)

# 导 论 从未消逝的幽灵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开篇即以“幽灵”形容 19 世纪欧洲大陆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当时发展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政治力量，遭到欧洲众多政治派别的攻击与围剿。用“幽灵”譬喻共产主义运动可谓恰如其分。幽灵看似虚无缥缈，四处游荡，无迹可寻，实际上无处不在，如影随形，驱之不散。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共产主义运动所反抗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坚如磐石，是因为其背后耸立着幽灵一般的资本力量。它不仅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起形成并壮大，而且渗透到现代社会的诸多领域，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决定着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进程。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围绕“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争论尚未尘埃落定，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又一次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马克思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世人不得不承认，就在一些自由主义者欢庆历史终结论、推广“华盛顿共识”、鼓吹私有化市场化的呼声尚未消退的时候，马克思的《资本论》如同从未消逝的幽灵，无情地洞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在批评现代金融制度、寻求危机化解途径的众声喧嚣中，西方左翼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声音尤为值得重视。他们不仅唤起了人们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关注，而且推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和“《资本论》热”，激起更多的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 一、《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新阶段

2007 年夏季，以美国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两大金融公司陷入危机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很快从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祸及全球，演变为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表面上看，引发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产品的“创新”。美国的银行为了创造利润而不断对金融工具进行“创新”，推出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并销往世界各地。包括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在内的金融工具虽然推动了经济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同时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经济泡沫，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对此，主流经济学家大

多将次贷危机的根源诉诸信息不透明、政府监管缺位、政策失误或是对风险的低估，甚至追溯到人性自身的贪婪。然而，这些解释仍然局限于资本世界的制度框架，缺乏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反思，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在剖析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追问经济危机根源的争论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再度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危机出现以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畅销，一度成为圣诞礼品。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思想家、激进团体和学生组织也纷纷组织各种研讨班、学习小组和新闻访谈，讨论《资本论》的观点及其意义。各种以解读《资本论》为主题的通俗读物、专题讲座和影视作品，在日本、韩国和德国赢得了大量读者、听众和观众。在阅读《资本论》的人群中，还出现了一些西方政界、商界人士的面孔。一时间，讨论《资本论》成为舆论界、思想界的热门话题。马克思的头像一反常态，出现在经常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媒体如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时代》周刊的显著位置。2009年5、6月号的美国著名时事刊物《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完全摩登马克思》(“Thoroughly Modern Marx”)的文章，称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准确预言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及其导致的金融海啸等后果，还提供了解救药方。可见，21世纪初的这场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阅读、讨论《资本论》的热潮。当然，这股热潮并不能直接催生对《资本论》思想的深度研究，而只是提供了重新研究《资本论》的氛围和契机。我们也注意到，拨开各色新闻舆论的重重迷雾，在反思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正进入新的阶段。

从某种程度上说，阿尔都塞(Althusser)和巴里巴尔(Balibar)等人合著的《读〈资本论〉》问世以后，《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研究才被明确界定为学术问题，《资本论》的研究者才从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支持者扩大到大学校园里的教授学者。首先引起争论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方法或是辩证法问题。人们激烈辩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是否采用了恩格斯所概括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它的叙述方法是否与黑格尔(Hegel)的逻辑方法相一致。这场争论的早期成果收录于1980年理查德·诺曼(Richard Norman)和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主编的《黑格尔、马克思和辩证法：一场辩论》一书。<sup>①</sup>应该说，《资本论》的逻辑方法和辩证法问题以及这一问题所涉及的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特别是与黑格尔辩证法之

---

<sup>①</sup> 参见 Richard Norman and Sean Sayers: *Hegel, Marx and Dialectic: A Debate*,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0.

间的关系问题，向来是马克思思想研究的热门话题，以至于我们可以根据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将众多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区分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试图复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回应阿尔都塞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重新阐释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和辩证法思想。<sup>①</sup>克里斯托弗·J.亚瑟(Christopher J. Arthur)和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堪称这一派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根据马克思后期的著作《资本论》而不是早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考察马克思思想，重点探讨《资本论》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逻辑学》之间的联系，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时都使用了一种“系统辩证法”或是“整体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影响，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共时性分析，而不是历时性的描述，有助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变动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对象。在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继承了18世纪苏格兰学派乃至更早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所开辟的传统，旨在讨论与政治相关联的经济事务，而不是一般的经济结构，因而是一种对社会整体结构的探索。这样，在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这里，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就从纯粹的方法论考察转入与政治哲学相关的整体性思考。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重读《资本论》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sup>②</sup>他一方面认为应该在《资本论》而不是《资本论》手稿中寻找《资本论》的真理，强调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思想的支持与阻碍；另一方面通过重读《资本论》而建构自己的现代社会理论。他批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以市场形式为起点，认为随着资本的集中，一种有组织的形式会取代市场，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雅克·比岱指出，在市场和组织之外还存在第三种真正有效的社会调节媒介，即市场和组织多层次多途径的协调。他把市场与组织之间的有机组合定义为“元结构”。现代社会统治阶级所运用的是市

<sup>①</sup> 参见 Fred Moseley: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93; Fred Moseley and Martha Campbell: *New Investigations of Marx's Method*,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97; Tony Burns and Ian Fraser: *The Hegel-Marx Conne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Brill, 2004; Norman Levine: *Marx's Discourse with Hegel*,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sup>②</sup> 参见 Jacques Bidet: *Exploring Marx's Capital: Philosoph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eiden, Brill, 2007.

场和组织相互补充和相互对立的控制手段，而被统治阶级受到市场、组织以及二者结合体的统治。实际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等地区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治理危机，导致经济增长减速、政治局面动荡、生态环境恶化、社会运动高涨。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促使人们在研究马克思《资本论》时注重阐发其中丰富且深邃的政治哲学思想。哈里·克里弗(Harry Cleaver)早在 1979 年的《政治地阅读〈资本论〉》中就明确反对法兰克福学派针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主张从《资本论》中挖掘出反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在他看来，《资本论》不只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它也为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资本论》描述了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而逐渐形成，并确立阶级意识、展开阶级斗争的过程，因而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sup>①</sup>另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以一种“再现”的方式来读《资本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辩证法“再现”了或者说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机制，其真正意义不是政治性的，也没有任何政治后果，而它是一部关于失业的书。<sup>②</sup>虽然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某种程度的拒斥反映了当代西方左派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等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策略的背弃，其观点与哈里·克里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他对《资本论》的重新解读启发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思资本主义的深层次机制及其显露出来的弊病，尤其是资本主义体制无法摆脱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西方学者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逐渐从方法论层面转向政治哲学，并且深入到探究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和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自 19 世纪末《资本论》被介绍给国人以来，它与中国人的命运就息息相关。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义

<sup>①</sup> 参见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这部著作在 2000 年再版，作者在为新版本撰写的前言中称，对《资本论》的政治式解读是在反思马克思主义传统、吸收新社会运动的主张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建构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机制，并使得超越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替代性存在方式得以可能。

<sup>②</sup> 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无反顾地承担起翻译、介绍和传播《资本论》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起步，其侧重点是《资本论》的辩证法和方法论研究。以 1963 年吴传启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书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阐述《资本论》第 1 卷中诸多经济范畴的形成与演变及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所运用各种逻辑方法，如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逻辑和历史、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方法，从而认为《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其中的经济范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现实历史和内在逻辑。尽管这一时期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苏联学者的影响<sup>①</sup>，但是，它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趋势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认识社会现实、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科学方法。这一研究趋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延续，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潮，不仅翻译出版了苏联、日本学者研究《资本论》辩证法和方法论的著作，而且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sup>②</sup>。国内学者一方面详尽细致地考察了三卷本《资本论》各经济范畴的内涵和联系，另一方面比较了《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的异同，从而在文本解读和研究视域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全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生活出现了剧烈变革，客观上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从方法论层面深入到历史观层面。人们深入阐发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从理论上回应科学技术革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现实问题，从而建构具有现代水平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哲学、社会发展理论、人学理论和主体理论，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

<sup>①</sup> 这一时期出版了苏联学者的两部《资本论》辩证法思想研究著作：〔苏联〕安·阿·马卡洛夫：《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7；〔苏联〕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冯维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sup>②</sup> 相关代表作有：章士嵘的《〈资本论〉的逻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李建平的《〈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该书增加了两篇附录后再版为《〈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刘景泉的《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刘永信的《〈资本论〉的逻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田光的两卷本《〈资本论〉的逻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的生命力。<sup>①</sup>

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进程加速，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相应地，资本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渐加剧。资本追逐利润、不断增殖的逻辑，不仅推动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且广泛渗透到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对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文化艺术、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市场化进程引发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文化庸俗、思想极端、道德败坏、价值沦丧等问题可谓触目惊心。这些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对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促使人们反思贯穿于迄今为止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问题。所谓现代性，主要是指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铸就的以科学和理性为标志的近代启蒙精神。在剖析当代中国问题、反思全球化和现代化、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马克思的《资本论》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一些学者认为，形成于 19 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不是简单地否定科学和理性精神之于人类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意义，而是揭示了近代科学和理性精神的片面性和狭隘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洞察到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现实根基，阐明了资本逻辑与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揭示了资本创造文明和追求价值增殖的双重逻辑对经济全球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此，《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进入多向度展开的第三阶段。一是对《资本论》的学术史和文本学研究，既从历史维度梳理了《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以来对其哲学思想研究的类型，又介绍了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版(MEGA2)已出版部分中涉及的《资本论》文献，从而为重新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廓清了前提条件<sup>②</sup>；二是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认为《资本论》不是“运用”而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

<sup>①</sup> 相关代表作有：孙承叔、王东的《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想)》(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冯景源的《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张雄、陈章亮的《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唐正东的《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sup>②</sup> 参见聂锦芳：《重新研究〈资本论〉：基本原则与基础文献》，见《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2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 1 期。

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sup>①</sup>；三是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不仅阐发了《资本论》及其手稿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念、观点和方法的批判，揭示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对立，而且尝试在当代语境中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话语。

以上简要回顾表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日趋重视阐发其中的政治哲学思想。这既是出于学术研究不断转换研究视角、扩展研究视域的内在要求，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生活世界、回应现实挑战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市场化力量逐渐强化、完全渗透的状况，市场化改革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进程。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商品交换、贸易等市场形式亘古长存，但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资本逻辑是推动并主导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它甚至要求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统辖在市场关系中。《资本论》及其手稿所要揭示的就是资本的形成史和现代史，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生活，而不局限于物质生产与消费的经济领域。因此，《资本论》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不仅揭露了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局限性及其现实根基，有助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政策；而且建构了一种植根于现实的阶级斗争基础，指向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哲学。我们认为，当前推进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研究，应该进一步从宏观层面深入到微观层面。一方面，要运用《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来分析当代社会的政治问题，辨析各种政治理念和学说，阐明马克思主义应对现实挑战和具体问题的立场与主张；另一方面，要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梳理《资本论》的关键范畴，考察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对近代政治哲学所展开的批判，进而丰富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并且结合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探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运用和发展，以此阐明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意义。本书之所以选取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作为考察对象，正是希望从后一方面推进《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

## 二、哲学视域中的资本概念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根据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capital)源自后期拉丁语 caput一词，caput

<sup>①</sup> 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是头部的意思<sup>①</sup>，在 12、13 世纪，“资本”逐渐具有了资金、存货、款项、生息本金等含义<sup>②</sup>。“资本”一词的出现与当时主要发生在意大利的经院哲学家们关于利息的争论有关。<sup>③</sup> 起初，“资本”与债务、财富、财力、金钱、价值、资金、财产、银钱、本金、资产、祖产等词相互竞争，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后来，“资本”逐渐取代其他用词而最终为公众所接受。在 17、18 世纪人们所编写的词典中，“资本”指的是一笔钱、一笔债权或一笔商业资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不假思索地把财富、价值等同于货币。自 1770 年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Turgot)率先使用之后，“资本”开始具有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含义<sup>④</sup>：“资本”不仅仅是以往劳动的成果与积累起来的劳动(等同于“资产”)，更意味着它自身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被重新取得并反复更新<sup>⑤</sup>。

根据布罗代尔等学者的考察，我们发现，尽管“资本”一词的起源与演变始终伴随着无尽的争论，但确定无疑的是，“资本”一词的出现离不开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关于高利贷、货币与利息问题的争论。而这场持续多年、影响深远的争论背后若隐若现且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便是西方思想史中经济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关系。<sup>⑥</sup>

<sup>①</sup> Caput 同时是罗马人口财产调查中所使用的财产单位。参见〔英〕肯尼思·麦克利什：《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上卷，查常平、刘宗迪、胡继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第 192 页。

<sup>②</sup> 根据《辞源》的解释，汉语中“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曲中，指的是本钱。参见《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第 2960 页。

<sup>③</sup> “资本一词正是在意大利被创造，被驯化和逐渐成熟的。它于 1211 年肯定已经问世，于 1283 年以商行资本的含义出现。在十四世纪已普遍使用”。当时的一份布道词声称：“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 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 236 页)。

<sup>④</sup> 拉法格(Lafargue)考察了“资本”一词在法语中由形容词到名词并逐渐具有经济意义的演变过程，认为“资本”是从 18 世纪才开始具有作为获得收益的财产的意义(参见〔法〕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王子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第 28 页)。

<sup>⑤</sup> “参加新的劳动使得资产得以重建和新生，从而产生收益和增值。生产不断在吸收并再造资本”〔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 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 245 页)。

<sup>⑥</sup> 著名经济学史家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指出：“经济学与哲学的历史均已表明，政治经济学，或者对于人类社会及其物质财富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政治，或者对于第一原则和终极事务的研究，在不同时期彼此施加影响”(James Bonar: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3)。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也认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影响便构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参见 Geor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5, p. 319)。

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不仅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展开了探索，确立了关注本体而否定现象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且对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无穷奥妙充满着好奇。处在人类文化童年时期的古希腊思想家为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门类奠定了基础。在经济学方面，尽管当时尚未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科，“经济”(oeconomicus)在古希腊语中指的是“家庭管理”，但无论是在经济分析还是经济思想方面，古希腊都堪称西方经济学史的起点。其中，柏拉图(Plato)、色诺芬(Xenophon)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提出了后世思想家所热衷探讨的问题，他们对分工、分配、货币以及财产问题的讨论反映了当时奴隶制度下自然经济的发展状况，有力地维护了古希腊城邦的等级制度与统治秩序，并且初步分析了商品货币经济的某些特征，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从整体上看，古希腊的经济学与哲学外在地联系在一起。当古希腊的哲学家为寻求普遍真理而探究自然界时，作为“爱智慧”的哲学具体指的是有关现象世界背后的本体世界的、最少实用性又最具普遍性的知识，如巴门尼德(Parmenides)关于“存在”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第一哲学”。因此，经济领域的事务便被排斥在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大门之外，而古希腊思想家对经济事务的看法更多地是与他们的伦理道德和政治观念相关。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社会分工源于人们需要的多样性与禀赋的差异性。一方面，人类的生存要求满足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需要，而孤立的个人无法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这就必然会产生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邦；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在禀赋方面的差异与局限，每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主要从事某一特定的工作，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正义”。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试图以社会分工来说明阶级、国家二者的形成，以及正义问题，尽管蕴含着几乎天才般的洞见，但主要充当了日渐衰败的贵族统治的精神支柱。此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商业事务的厌恶，尤其是他们反对高利贷的态度，既与他们作为贵族的立场相关，又与其伦理观念密不可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快乐、荣誉与思辨虽然都不等于幸福，不是最终的善，但它们与人的德性部分相关，因此，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都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活动；而牟利的生活，由于其所追求的财富仅仅是实现善的手段，与德性无关，因而被排除在人的实践的生命活动之外。

在西欧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以前，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始终保持着这种外在的联系：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以及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关注处在他们的哲学形而上学的视野之外，更多地

反映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与政治观念，而经济分析在这一时期尚处于萌芽阶段。

从13世纪开始出现的商业、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逐渐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与精神风貌。资产阶级对工商业活动的强烈兴趣与经院学者的冷漠态度截然对立，随着资产阶级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一兴趣演变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激励着世俗知识分子深入研究经济事务。这时，经济事务真正进入哲学的视野之中，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才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这一时期兴起的社会哲学与历史哲学为后来的古典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前提。关于“自然法”与“市民社会”的讨论，上接经院哲学的自然法概念，下启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概念所包含的个人主义倾向、功利主义原则和理性主义态度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的经院学者和洛克(Locke)、休谟(Hume)、霍布斯(Hobbes)、笛卡尔(Descartes)、卢梭(Rousseau)等人的思想。作为古典学派的奠基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分别讨论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如何在道德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引导与制约下走向和谐状态，因此，与其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最好的哲学注脚，不如说二者体现了斯密思想中相互区别、互为补充的两方面。另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探讨资产阶级社会而形成的范畴、原理与视角成为哲学的批判对象，经过改造之后作为构成要素而被纳入哲学体系当中。例如，在黑格尔那里，财产与所有权、劳动与分工、市民社会与国家等矛盾关系是世界精神的自我运动在政治、伦理领域的呈现，因此，政治经济学及其范畴被合乎逻辑地整合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并且成为黑格尔法哲学思考中被扬弃的中间环节。不仅如此，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并将古典经济学与哲学和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的思想家，他的辩证法思想受到了当时古典经济学的成就与局限的双重影响。<sup>①</sup> 而马克思自觉地继承并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思想文化的这一传统，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而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材料；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了不同时期的马克思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特征。可以说，作为马克思哲学主要内容的基本原则、历史观与辩证法思想均完成于马克思不

<sup>①</sup> 参见 Geor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5.

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而这些基本原则、历史观和辩证法思想又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和理论武器。

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继承并发展了西方思想史上哲学与经济学相互影响的伟大传统，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不能被简单地归入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或经济学，更不能被粗暴地割裂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哲学与经济学的统一使得马克思思想既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也不同于日益实证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对于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伦理的反思。这同时意味着，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而形成的核心概念在社会历史性的含义之外，既具有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又具有政治哲学的内涵。换言之，当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时，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或概念一方面被马克思赋予了深刻的哲学内涵与意义，另一方面又关涉到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根基。对此，马尔库塞(Marcuse)在区分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概念时所作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他说：“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sup>①</sup>对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我们同样应该作如此理解。一方面，马克思始终是在现代意义上理解资本概念的。在他看来，尽管从词源学的角度而言，“资本”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sup>②</sup>，但是，资本概念所具有的现代内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sup>③</sup>。另一方面，马克思之所以界定自己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为“资本的理论”<sup>④</sup>，是因为在他看来，“资本”这一伴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而出现并逐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现象，既是整个现代社会的核心与象征，也是揭开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秘

<sup>①</sup>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23页。

<sup>②</sup> “如果谈到在古代人那里还没有出现的‘资本’这个词(虽然在希腊人那里，*ἀρχαῖα*[不加息的原始资本]一词相当于拉丁语的*principalis summa rei creditae*[借贷的本金])。那么至今还带着自己的牲畜群在亚洲高原的草原上放牧的游牧民，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最初的含义是牲畜，所以至今在法国南部，往往由于缺乏资本而订立的分成制契约恰恰例外地被称为：*Bail de be stes à Cheptel*[牲畜租赁契约]。假如用说得很蹩脚的拉丁语来表达，那么，我们的资本家或*Capitales Homines*[首脑人物]便成了‘qui debent censum de capite’[应交纳人头税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09页)。

<sup>③</sup> 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道：“使我很感兴趣的是，从他[即梯叶里(Thierry)——引者注]所引证的文件来看，《catalla, capitalia》，即资本这个词是随着城市公会的发展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第90页)。

<sup>④</sup> 马克思致柯瓦列夫斯基(Kovalevsky)的信中说：“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31页)。